

中国古代社会主义与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 李学俊

2020 年是当代人类文明的大考之年。中国经受了考验,并以优异成绩成功闯关,充分显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一、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是怎么来的？

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 结合中国历史传统与当代国情,借鉴其它国家的经验教训发展出来的。

习近平主席就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是在对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2013 年 3 月 17 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讲话)

如何认识中国的古代历史？这涉及关于社会形态划分问题。

前苏联与现代中国许多学者都认为,马克思提出了从原始共产主义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国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并照搬套用来划分中国历史。但是,也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段圣桥在《马克思从未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总之,我认为马克思从未提出过‘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而只提出过‘三大社会形态理论’”。

所谓三大社会形态划分的学说就是马克思总结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主要论据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人类历史的总结与划分:“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无论是五种社会形态说还是三种社会形态说,事实上正如马克思在回答俄国革命党人的时候就肯定地阐明,这些划分仅仅限于西欧各国。

《资本论》传播到俄国的时候,俄国知识分子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 俄国可否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1881 年 2 月 16 日,女革命家查苏利奇就此写信咨询马克思, 马克思写信回复道:

“亲爱的女公民: ……我希望寥寥几行就足以消除您因误解所谓我的理论而产生的一切怀疑。

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 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

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

显然,马克思不赞成“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发展阶段”这种理论,并不认为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是人类历史普遍规律。

中国许多学者也反对用五种社会形态来牵强附会中国古代社会定义与分期。

何炳棣就指出:“商周社会决不是奴隶社会,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也从未曾有过奴隶社会的阶段。”(何炳棣:《商周奴隶社会说纠谬》,载《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七卷二期,文中,力言。)

钱穆批评一些学者套用西方历史模式后指出:“西晋有罗马奴隶社会,但中国没有。”“西方农民是奴隶,中国则为佃农与自耕农。”(《钱穆:《中国经济史》第 3 页,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年版。)

黄现璠专著《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用丰富详实的史料充分论证了中国古代没有奴隶社会。 他说:“中国历史上没有奴隶时代,汉族

没有,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也没有。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仍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特例,不是通例。”(黄现璠《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79 年第 2、3 期。)

众多研究表明,古代中国虽然也产生了奴隶,但并没有进入古希腊,古罗马式的奴隶社会,即使是中国的封建社会与欧洲的封建社会也大相径庭。

那么,中国古代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呢？

二、诸子关于社会形态划分的学说

中国古代关于社会划分的理论主要有孔子的“大同”“小康”说,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庄子的道德标准说等几大理论。

孔子划分共有两条标准。 第一,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形态划分根本标准。

即以生产资料是“天下为公”还是“天下为私”为标准来划分。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天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罚。是谓小康。

此话前还有一段十分重要的话,暗含着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孔子感叹自己处在私有制社会,没有赶上公有制大同社会与夏商周三代“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表达了自己有志于重新建立大同与小康社会的理想。可见,按孔子划分标准,社会只有公有制社会和私有制社会两大社会,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就是远古公有制社会中有两种不同的亚形态社会。

第二, 民众的组织与社会治理方式是社会形态划分的政治标准。

大同社会尚未产生国家,所以,主要由贤德的能人担任氏族,部落的首领。此时,民众主要依靠他们的威望与倡导的道德就能自律,所以“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随着人口需求增加,低下的生产供给不能满足,资源有限与需求增加的矛盾逐渐激化,于是发展到了“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由于“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仅仅靠贤德人物的威望与道德准则已经不能管束人们由于资源财富不足而产生的损人利己行为及其对公有制的颠覆性威胁,需要比道德自律更强大的外力来约束,以保证公有制延续,于是具有能从外部予以强力保护的国家诞生,同时拥戴贤德人物为国家元首,君王天子产生,这就是神农、黄帝、帝尧、禹、汤、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等。孔子于是将礼、乐、文、武组织民众,由政府治理,身份有等,产权明晰,社会和谐有序的公有制社会定义为小康社会。

三、华夏国家起源于保护公有制

国家如何起源？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人民提供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美丽的环境,正是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突出任务。

五、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基础性作用

消费是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正是由于不断提高消费水平的愿望,才刺激了生产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改革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消费水平大幅提高。特别是最近十年,由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改变了过去主要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 2010 年到 2019 年, 投资率由 47.0%下降到 43.1%, 最终消费率由 49.3%提高到 55.4%, 相当于 2019 年有 6 万亿元以上商品由过去用于投资或出口转变为用于居民消费, 人民从经济增长中更多获益。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们提高消费水平还有很大空间,就人均消费额来看,美国是我国的 4 倍。只要人们能够通过改革等措施把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出来, 就能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建议》提出“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兴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为未来扩大消费指明了方向。住房和汽车作为百万元级、十万元级的传统消费品,对整个消费市场具有决定性影响, 是其他消费难以替代的,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以每人汽车保有量来看,美国是我国的 5.6 倍。《建议》提出推动汽车等消费品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就是要求现行为改善交通拥堵状况而采取的汽车限购的管理办法,转变为改善汽车使用环境和使用强度等管理办法,可让更多消费者圆自己的轿车梦。促进住房消费健康发展,要按照“只住不炒”的要求,增加住房供给,稳定住房价格,满足广大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通过增加共有产权房,租赁房,新市民房供给等

全球学界主要有自然演化论、社会契约论、战争论和阶级斗争论。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主要以摩尔根发现的美洲易洛魁人,古希腊,古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为依据,阐明国家起源于私有制。

“奴隶制起初仅限于俘虏,但已经开辟了奴役同部落人甚至同民族人的前景;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近开始蜕变为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掠,变成一种正常营生,一句话,财富被当做最高福利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财产缺少的只是一样东西,即这样一个机关, 它不仅可以保护单个人新获得的财富不受氏族制度共产制传统的侵犯,不仅可以使以前被轻视的私有财产神圣化,并宣布这种神圣化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而且还会给相继发展起来的获得财产的新形式,因而也是给不断加速的财富积累, 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所缺少的只是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可以使正在开始的社会划分为阶级现象永久化,而且可以使有产阶级剥削无产者的权利以及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永久化。

而这样的机关也就出现了。国家被发明出来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第 106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

原始共产主义解体以后进入私有制奴隶社会。——这符合古希腊,古罗马和德意志的历史。但是,中国古代的基本历史资料,即使现在也基本没有翻译介绍到西方,所以,他们并不知道,华夏地区国家起源恰好与之完全相反,国家不是起源于保护私有制, 而是起源于保护公有制,因此,华夏地区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也没有进入私有制奴隶社会。

诸子认为,国家起源于制止私人暴力争夺资源财富。《管子君臣下》曰: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夫有夫妇妃匹之合,善处群居,以力相胜。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独足不得其所。

发也就是说,原始社会人们和野兽共处群居。后来由于自然生产的食物与地盘有限,就发生了用强力争夺公有食物资源与地盘的现象。狡猾的人就诈骗老实的人,强壮的人就欺凌弱小的人,结果老、幼、孤、独的弱者都是不得食物和地盘。

这种行为是动物本能表现,遵循的就是动物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因此,此时的人与其它动物,除了生物学意义上的区别以外,没有行为的本质区别,没有什么“道德”可言。

管仲指出,由于觉悟的贤德智慧之人联合民众制止私人武力争夺地盘,资源与财富,禁止私人狡诈欺骗争夺地盘,资源与财富,保卫天然公有制度,纠正了弱肉强食野兽的动物法则,兴利除害,于是产生了人类特有的“社会道德”意识,并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守,使社会归于和平与公平。

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暴,而暴人止。为民生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是故道术德行,出于贤人。

可见,社会道德意识和民众在贤能之人领导下的集体行动有效地保护了公有资源与财富不被私人侵占,克服了社会冲突,保护了广大的人群,有利于人口的增长与繁衍,因此成为人民的共识与最初的风俗习惯,即社会道德规范;人民因有了贤德智慧之人领导与倡导,过上了人的道德生活,并有了道德规范和上升为制度的保障,于是,人民充分信任贤德智慧之人, 便把治理的权力授予他们,并因此组成国家,于是国家诞生了;

其从义理兆形于民心,则民反道矣。名物处

违是非之分,则赏罚行矣。上下设,民生休,而国都立矣。是故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

可见,管仲的国家起源说认为国家起源于保护公有制,并得到其他诸子认同,墨子、韩非等都作了类似的论述:国家是君子用道德团聚人民,与人民共享财富,获得君子的拥护而建立的,如果国家失德,争夺民众的财富集聚到极少数人手中,那么民众就分散叛离了,国家也就灭亡了。《大学》如是说:

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即使暴君夏桀也不得不承认, 国家失去了人民就不成其为国:

汤将放桀于中野,士民闻汤在野,皆委货扶老携幼奔,国中虚。桀请汤曰:“国所以为国者,以有家;家所以为家者,以有人也。今国无人矣,君有人,请致国君之有也。”(《国语左丘明解》)

小康社会虽然已经出现“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的现象,但是,国土及其资源还是属于国家公有。继承夏商王制的周朝《礼记王制》规定,分封诸侯与公卿大夫的土地,只有使用权,管理权和收益权,没有所有权,如果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天子可以削地,甚至收回。

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劓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畔,畔者君讨。

其次,名山大川等不予分封,继续为周朝国家公有。 凡四海之内九州,……凡二百一十国,名山大泽不以封, ……天子之县内, ……凡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以分。

综上所述,华夏地区的国家不是诞生于保护私有财富的需要,相反,是起源于保护公有财富的需要。因此,华夏国家不是为私有制度盖上有社会承认其合法性的机关。相反,是为公有制盖上有社会广大民众承认印章的机关, 盖上下否定私有制印章的机关。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就是实施生产资料公有制,并提出十大基本政策:

“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2.征收高额累进税。3.废除继承权。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7.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 and 改良土壤。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对于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古代中国小康社会实施了他们所说的若干制度政策,同时保护国民一切合法产权。为防止“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颠覆公有制度,于是有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实施礼制,有效的治理社会。

其中“以设制度,以立田里”就是在承认“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的现实合理性及合法性,并通过礼制保留大同社会公有制在小康社会延续。所以,国家“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罚”,于是国土及其资源的公有制和私人财富的合法产权都得到公平保

护,社会得到有效治理,井然有序。因此,小康社会就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建立了国家,并依法保护一切公私合法产权的社会主义社会。

正视历史可见,古代中国是社会主义故乡。正因为如此,孔子,孟子等诸子都有志于复兴小康社会。而管仲则在齐国建立了“以人为本”,尊道为政的管政社会主义(参见拙作《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

孔子(前 551 年—前 479 年)没有给自己所处的私有制社会定义,因为他所处鲁国,不久前,即宣公十五年(公元前 594 年)才颁布了《初税亩》,公有制则在逐步解体,华夏国家第一个私有制社会刚刚开始。

四、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与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小康社会主义在战国时期彻底解体以后,进入了公有制与私有制混合的混合型社会(限于篇幅,恕不展开)。

之所以称之为混合型社会是因为秦汉以后,中国虽然承认了生产资料私有的合法化,但是依然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国土及其各种自然资源的国有制。以汉朝为例,即使汉初文景之治时, 允许了私人任意开采矿山资源, 但汉武帝后,几乎都将资源收归国有。

汉、唐、宋、明等朝在保留国土资源国有制的同时,还不同程度地实施了若干社会主义政策。当汉武帝时期陷入内外危机的全面危机时,他任用桑弘羊,以管仲思想理论为指导,实施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政策,才使汉朝摆脱绝境,并创造了中华文明辉煌的时期(参见拙作《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美国学者,世界文明史大家威尔·杜兰特对此评述赞美德:

“武帝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民生经济问题,遂推行经济改革政策,实施社会主义,建立国营制度,以防止私人独占山川资源;避免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征收盐税,铁酒专卖,严防投机分子和商人剥削——他们放高利贷,囤积货物……武帝这些经济改革措施,一时收效宏达。……中国至此,达到鼎盛时代。”(时|威尔·杜兰特著:《世界文明史》第 481 页,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8 年版。)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研究社会主义第一人。其弟子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陈焕章指出,桑弘羊“使汉武帝在财政上有可能扩大中华帝国。他对国家政体的贡献是巨大的和永恒的, 他是如此巨大规模上成功地实践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一人。”(陈焕章著:《孔门理财学》第 341 页, 翟玉忠译 [美] 陆寿君校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年版)他在书中,用了八章来专门介绍古代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与政策。

孙中山先生认为, 中国自古就有社会主义的传统。在当选临时大总统以后,到上海工商界演讲三天,表达了他要实施社会主义的宏愿。他说“考诸历史,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宜其进行之速,有一日千里之势也。”(《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 507 页,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古代中国是社会主义的故乡, 有实施社会主义的悠久历史传统与肥沃土壤,而中国古代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政策与丰富实践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根本原因,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能够在生根开花, 结出辉煌硕果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古代社会主义重要的思想理论的核心部分就是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挖掘,整理,总结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正是复兴中华文明,解释中国历史与现实,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学派,掌握世界话语权的重要内容。

▶▶▶ [紧接 A2 版]

习近平主席向联合国做出了我国到 2030 年碳达峰、2060 年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 这是应对气候变化,保护人类共同的美好家园的重大行动。减少碳排放,涉及到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必须努力推进清洁生产,发展环保产业,推进重点行业和重要领域绿色化改造。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凡是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和节能、减少污染的经济活动,包括生态修复工程,无论哪个产业或产品,无论采用何种方式,无论国有、民营企业或外资企业,都要根据其减排量,一视同仁地给予相应的财政补贴和奖励,都应优先批准其投资项目,优先提供建设用地和资金支持,享受各种优惠政策。

第四, 围绕鼓励资源节约型消费方式,开展绿色生活创建活动,在需求端形成对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强大拉动力。生态产品的价值能否实现,归根到底要看是否能满足人民的需求。要从小学开始,开设环境教育课程,逐步在全国人民中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养成保护生态环境的习惯,努力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杜绝食物浪费。发展绿色消费。推行垃圾分类和减量化。鼓励使用可再生能源、低排量汽车和绿色出行方式。强化绿色发展的法律和政策保障,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

经验证明,我们要在经济发展中解决一些结构性难题,把薄弱环节搞上去,必须建立一个有利于补短板的市场机制,这样,就能做到事半功倍。否则,单靠财政力量和政府号召,往往事倍功半,甚至长期得不到解决。同样,补上生态环境这个短板,当前最重要的是,根据环保产业具有公益性的特点,建立一个能够把大量资金吸引到环保产业的市场机制。

要破除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的陈腐观念。不能认为强调保护环境必然制约经济发展。恰恰相反,环保产业正是现阶段亟待增加投入的新增长点。改善生态环境本身就是增加 GDP。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满

的需求巨大,必须保持一定的投资强度。《建议》提出要“拓展投资空间”,“优化投资结构,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投资的重点应放在:

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议》提出:“加快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产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构建一批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技术障碍,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完善科技体制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努力锻造一批像华为公司一样具有超强战略能力的企业,充当各个行业的领军企业。围绕提高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率, 改革技术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 探讨把更多职务发明收益归创新者,鼓励企业把研发机构设在海外, 择全球人才而用之, 以开放促进创新。围绕培养创新型人才特别是创新领军人才,改革教育体制。

二是新型基础设施。主要涵盖三个方面:信息基础设施,包括 5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融合基础设施,即对传统基础设施加以智能化改造;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包括一系列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完成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任务,需要巨额投资。钱从哪里来? 主要应通过债券融资。我国资本市场发育不充分,通过股市融资在企业的资金来源中占比明显偏低,通过债券市场融资的比重则更低。当前发展政府和企业的债券市场面临着历史机遇:中国经济率先在摆脱新冠疫情后复苏,世界各国投资者看好中国经济;人民币处于升值周期,投资中国政府和企业发行的长期人民币债券,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中国具

有全球最大的实体经济,正处于产业升级和数字化转型阶段,未来必将出现越来越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通过发行长期人民币债券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利于完善资本市场功能,助力扩大内需,为经济发展增添后劲,而且有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后,我国经济将跨上一个新台阶,为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三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领域的产品和服务,绝大部分属于公益性性质或半公益性性质。长期以来, 由于这些产品和服务主要依赖财政投入,财力投入不足带来供给短板, 发展长期滞后, 不仅制约着社会进步, 而且制约着经济发展。前些年推行政府与企业合作模式(PPP)进行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建设, 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是, 由于在操作上存在一些疏漏, 导致地方债务增加过快, 到期偿还困难。应当总结经验教训, 继续实施下去, 不能因噎废食。关键是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 投资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优选项目, 财政部门主要负责政策补偿, 政策性银行和证券主管部门负责配套资金支持。切记不要由一个部门包打天下。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对医疗、健康、养老的需求迅速增加,这就需要政府把予政立法、制订政策的职能与企业提供产品、服务的功能有机结合起来, 建立完善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如全国现有失能老人 2000 万人,半失能老人 3000 万人,建立完善的失能半失能老人照护体系,既能满足这些老人的紧迫需求,把子女解脱出来,又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根据日本的经验,一个照护师可照护两个失能半失能老人。我国建立健全照顾体系即可创造就业岗位 2500 万个,将为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提供一个新渠道。

让我们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继续努力, 为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